

闪光的足迹

刘忠





2 032 5381 6

闪光的足迹
刘忠



刘忠，1906年生于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原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军政大学副校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9年离职休养。

在民主革命时期，才溪乡有一千多志士为革命捐躯。正如刘忠同志1987年授勋时写到，我是这些志士中的幸存者，的确如此。刘忠同志虽然离休了，但在思想上、政治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紧跟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没有忘记为革命捐躯的战友，为了祖国早日实现四化，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同病魔作斗争，亲自动笔写下了十余万字的长篇回忆录。

这本小册子中收集的就是介绍他怎样同病魔作斗争，和他最近完成的回忆院校工作的文章等。

——编 者

目 录

- 纪念建军六十一周年 刘忠
回忆院校工作
- 纪念建党七十周年 刘忠
- 只有奋斗 才能成功 恩超
- 一代英豪
- “九军十八师”人物介绍 黄经福
黄元铭
- 将军之乡——才溪 黄元铭

纪念“八一”建军节六十一周年 ——对在战场上牺牲的同志追念

刘忠

我是一个幸存者。这次能光荣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首先要归功于革命先烈和各战场流血牺牲的烈士。他们为祖国、为人民，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授予最高荣誉勋章时，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为中国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先烈们！

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牺牲了成千百万的烈士。今天，我们得到荣誉，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正确的战略、战役指挥，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善战及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而分不开的。现我追念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的领导者和曾与我并肩战斗而牺牲的十位同志。

（一）张赤男同志：红四军第十一师政治

委员。1932年春，在江西新城镇战斗中壮烈牺牲。赤男同志是中央苏区闽西革命领导人之一，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领导参加了才溪土地革命。曾任红十二军二纵队司令员。1930年6月，他率部在长汀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纵队改任党代表。参加革命后是他教我学军事、政治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因而，我非常之敬佩他。

(二) 陈冬生同志：红军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三团副团长。1932年秋，在江西地区水口战斗打广东军阀时而英勇牺牲的。他原是国民党军队一个机枪连的连长。俘虏过来时，在我连任重机枪连连长，因他表现好，作战勇敢。（当时，团长林发同志有病，留后方休养），因此，提他当副团长，代理团长的职务。三次战争结束后，在开辟闽南进占漳州的途中，他亲自用机枪打下一架敌机。虽然他是从国民党军队过来的，但他反对国民党军队欺压百姓、抓丁拉夫的行为。思想进步、作战勇敢。

(三) 张兴同志：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政治处主任。1934年春，敌人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在大雄关守备战中，英勇牺

牲。张兴同志政治立场坚定，作战勇敢，是一位优秀政治工作者。

(四) 曾桂同志：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团长。1934年夏在福建地区新桥战斗中与敌白刃格斗而英勇牺牲。曾桂同志原是五团第三营营长，因团长阵亡，军团首长令提他任团长。五团在广昌与敌会战伤亡很大，补充了许多新战士，因不敢打仗，故我和他身先士卒，带头冲锋，结果他英勇牺牲，我负了伤未下火线，完成了这次堵截任务。这是追念的第四位烈士。

(五) 毛孝清同志：红一军团司令部侦察参谋。长征前成立侦察科时，他由作战科调来侦察科任参谋，长征途中，他为部队作出了很大贡献。1935年冬，部队到了陕北苏区，东北军张学良的部队奉蒋介石命令向陕北苏区进攻，我派他率便衣队去直罗镇侦察敌情、地形时，中弹牺牲。

(六) 张昌太同志：抗大三团政治处主任。抗三团奉命到冀中地区八路军三纵队训练初、中级军政干部。我团先在平汉铁路东日寇据点间来回转，没有固定的地点，不便训练干部，后搬迁平汉路西秦家台附近村庄，背靠晋

察冀军区。1940年春一个夜间，通过铁路以东背粮时与日寇遭遇，他中弹牺牲。昌太同志年富力强，工作责任心强、积极向上，作战勇敢。他的牺牲，我们团领导非常之惋惜。

(七) 左权将军：八路军参谋长。1942年夏日寇在太行、太岳山区进行大举扫荡时，左参谋长亲临指挥，在这次反扫荡中他英勇牺牲。我那时在太岳地区三八六旅工作，负责开辟中条山抗日根据地，闻此消息，心情十分悲痛。左权同志是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参谋长。在长征前，一军团司令部成立侦察科，调我去任该科科长，因我不懂参谋业务，担此任十分免强。左参谋长就亲自教，对我鼓舞很大。他说：“侦察工作很重要，你政治上很强，作战勇敢，不懂就学。指挥员正确的决心来源于准确的侦察，侦察工作是首长的耳目……。”长征中，我是受左参谋长直接指挥领导。他牺牲后，我专门写了文章悼念他。

(八) 楚大明同志：晋冀鲁豫四纵队十旅的副旅长。1947年春，在山西地区汾孝战役中，他头部受伤，英勇牺牲。他是我军中的一员猛将，他从担任连、营、团、旅指挥员间共

负伤二十九次。对敌人非常恨，对战士十分爱。是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我永远怀念他。

(九) 韩均同志：晋冀鲁豫四纵队副司令员。因患重病，医治无效，于1948年逝世。当时，我是该纵队参谋长，对参谋工作不够熟练。纵队常委开会时，他提出：“我们两个职务不变，工作可变，你在前方指挥作战，我给你当好参谋长，主持司令部的工作”。后听说韩均副司令员病逝，我非常痛心。

(十) 李培信同志：华北野战军第十五纵队四十四旅政治委员。1948年冬，攻打太原的淖马要塞时，他在前面同旅长一起指挥战斗而英勇牺牲。李培信同志是山西省地方党政干部，而调来任旅政治委员，是位优秀干部。在作战时，他随着旅长在前线指挥。这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委员，值得悼念。

以上十位同志是纪念“建军六十一周年我授一级红星荣誉功勋章后，回忆在国内第二次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流血牺牲的同志，我沉痛追念他们！”

另外回忆1930年6月，福建区新编的红军

十二军第二纵队在长汀编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纵队后，经江西至湖南参加第二次攻打长沙的九位在解放后病逝的同志是：刘亚楼、袁子钦、罗舜初、傅连璋、王奇才、王集成、叶青山、杨尚儒、涂则生等九位，他们如活着，也应得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我授荣誉章后，特对他们作回忆追念。

1988年8月1日

院校工作回忆

——纪念建党七十周年

刘忠

从一九五〇年七月我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校务部长起，至一九七九年二月，总政通知我离职休养止的三十年中，一直从事院校工作。在我一生五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有三十多年是在院校渡过的，其中包括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红军学校学习，抗日战争时期在抗大学习和工作了五年。由于从事院校工作时间较长，特别是对行政管理与教学保障工作比较熟悉，考虑到院校工作在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写下这篇院校工作的回忆，作为向建党七十周年的献礼。

一、在刘伯承元帅领导下，参加创办军事学院

一九五〇年十月中旬，中央军委任命我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校务部长”，我于十月二十二日到南京向刘伯承元帅报到，在刘伯承元帅的领导下，参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的筹建工作。当时，我们办学校没有经验，邀请了苏联顾问。我到南京后，苏联的几十名顾问也到了南京。刘帅要我去见苏联的首席顾问，并指出，陆军大学第一项工作是组织体制问题，首先要确定校名。苏联首席顾问说：学校是培养陆、海、空军合成军队指挥员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的，叫陆军大学不确切，建议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学院在院长、政委的领导下，设三大部：即训练部、政治部、院务部；先设两个系，即高级速成系，学制一年，基本系，学制两年半。我把苏联首席顾问的建议向刘帅作了汇报，他说，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后，并任命刘帅为院长兼政委，陈士渠任训练部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我任院务部长兼政委，朱有芹、刘君雅为院务部副部长。院务部设部党委，我为党委书记。

学院的组织体制，刘帅要我负责同首席顾

问再商量，这是我在军事学院的第一项工作。到一九五二年春，学院完全接受了苏联首席顾问的意见。即院直属四大部：训练部、科学研究所、政治部、院务部改为物质保障部，教授会改为教研室，直属院领导，教务处改为教保处归训练部领导。学员系有高级速成、情报、空军、海军、装甲兵、炮兵、政治系，以后又设战役、战史、函授、防化学兵等共十二个系，均属院直接领导。我们物质保障部设政治、行政管理、军需、财务、供给、营房、卫生六个处及一个演习团（辖坦克、炮兵、工通、警卫四个营）。基本上仿效了苏联伏龙兹军事学院的组织体制。刘帅说，这个体制是：

“横宽纵短，单刀直入”。经院党委讨论通过，可即报中央军委批准执行。接着，刘帅指示，体制确定后，着手搞工作职责和工作制度。

第二项工作是设立联华公司（即做生意）。刘伯承院长给我的任务是：六大任务七个字“衣、食、住、行、健康、用”。但他又明确了我的工作重点，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吃的问题搞好了，就完成了院务工作百分之七

十的任务。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东西是一句空话。因供给制度有限，有必要做生意赚点钱来补贴、改善生活。因此，刘院长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我去北京总后勤部找黄克诚部长解决。军委首长很快就批给了一百亿元人民币（旧币，一万元折新币一元）给学院设立联华公司。部党委研究由朱友芹副部长专门负责。于是，在东北、天津、上海、广州等市，从北到南都有军事学院的联华公司，名字很响亮，赚了不少钱。这些钱主要用于补贴、改善学员、教员的生活。

在改善生活中，对炊事员的烹调技术，刘院长也有具体的指示。刘院长说：“这不能简单地看，吃饭问题一天三顿人人有份，南方人吃大米，北方人吃面，江西、湖南人吃辣椒，四川人吃麻、辣，山东人吃大葱，山西人吃酸醋等等。我们的学员是胜利之师，来自全国各地，如吃饭问题能基本上做到大家满意，这是一门大学问。”遵照刘院长的指示，院务部党委作了详细认真研究，并分工刘君雅副部长重点管理伙食生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苏联的后勤顾问向我提出建议，学院应该设面包房，

菜要讲究营养，而不要搞太复杂的口味。根据刘院长的指示，没有接受苏联顾问的意见。我说，顾问同志的意见好，但在我们中国行不通，请顾问到我们食堂看看尝尝，征求学员的意见好吗？他同意了我的看法，去食堂看了后，认为我们有一套管理伙食的办法，表示满意。同时他们也愿意吃我们的饭菜了。

对学院的伙食生活问题，学员普遍反映比较满意。一些学员见到我说：“部长同志，伙食办得很好，应该表扬你、感谢你！”我说：“希望你们学习好，当好你们的司务长是我的职责。”当时学院一些领导提出，“教好、学好、吃好、玩好”。并说教好是训练部的责任，学好是教、学员的努力，吃好是院务部的问题，玩好是政治部的事情。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认为教好、学好是应该的，吃好、玩好是无底的，吃好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我发现有个别学员在大红楼看越剧时，跑到后台去喝一百块钱一杯的香茶，这是玩好吗？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第三项工作是解决教室等问题。我们军事学院的院址，是设在原蒋介石的国防部大院，

北极新村、炮标、马标，旅志社、盐务局等均拨归我们。房子是漂亮，但不宜于教学之用。因此，立即要修改大、小教室、专修室、图书馆等。大礼堂是蒋介石的讲演堂，花了不少劲改建，设冷、暖气，用去八十余万元新人民币。学员系不断地增加，到一九五五年初，建立了十二个系。如：战役、高级、基本、情报、政治、海军、空军、装甲、炮兵、战史、防化、函授等系。为了解决房子问题，刘院长给南京柯庆施市长当面打招呼，得到了柯市长的大力支持。如战役系、函授系是最后设立的，并且都是高级干部，柯庆施市长就把宁海路、天目路、郎牙路、莫干路等这些过去是国民党高级军官的住宅区，全部拨给我们了。

我们在国防二院、马标、小营等地区修建了十几栋教职员的宿舍楼。添建和改建花了不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今天回想起来，当时要不是刘伯承院长亲自出面，是很难解决这些问题的。

第四项工作是教学物质保障问题。教材、教具，实物见学等项是当务之急。军委决定除

建立演习团外，还抽调了各种类型的坦克及大口径的火炮作为实物见学之用。但还有印刷厂、教学使用的吉普车没有解决。于是，刘伯承院长给曾山同志写了亲笔信，请他帮助解决。曾山同志当时是上海市财经物资委员会主任，是专管财经物资调配的。我拿刘院长的亲笔信去上海见了曾山同志，上海市长、市委书记是陈毅元帅兼任，曾山同志请示了陈毅元帅，他非常慷慨地批调了一个完整的印刷厂给学院，包括所有的设备和人员；又批给缴获来的美国吉普车二十辆。曾山同志问我，“还缺什么”？我说，还希望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印刷用的纸张和汽油，他亦一一解决了。对学院的教学工作非常关心，特别是对刘伯承院长十分尊敬。我代表军事学院常委向他们表示了感谢！

一九五一年秋，在蚌埠市以东的临淮关，组织了一次见学演习。在演习前，刘院长指示，要我负责解决野外见学的折叠桌、帆布凳、行军床、望远镜和教、学员装学习材料的手提包，全院的教员、学员每人一个。解决上述的教学保障用具，经费全由军委报销。军委